

郎咸平说

我的经济改革观



郎咸平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序言

我对本轮经济改革总体上持谨慎正面评价

郎咸平

各位朋友，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《郎咸平说：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》，是我继出版《郎咸平说：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》和《郎咸平说：改革如何再出发》之后，第三本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发展路线图的作品。我在这本书中，试图告诉各位，我对新常态与其他专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；我预测，新常态对国家、企业和个人，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，将远远超过邓小平“南方讲话”。我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。当然，我的预测以“全面深化改革”成功为前提。

众多迹象表明，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。我注意到很多学者和官方机构对新常态所做的阐释，告诉各位，他们都是就现象论现象，并没有抓住新常态的本质。我的理解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，就是透过改革，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，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

我一直认为，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制度问题，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，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、平等、公平、竞争和博弈合作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习近平主导的“全面深化改革”透过“三板斧”，使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了新常态：第一板斧，简政放权，释放市场活力，就是所谓的“习李新政”；第二板斧，透过三中全会《决

定》，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，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其核心是压缩行政权力，还私权给公民和企业，即所谓的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；第三板斧，透过四中全会《决定》，规范那些被压缩的公权力，以实现所谓的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和“法定职责必须为”的法治目标。

尽管如此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我依然认为，四中全会《决定》是一个为市场保驾护航的政策。这些就是我在本书导论《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以新常态革除旧制度》所阐释的主要观点。不认识到这些，我们就无法理解新常态，也无法判断中国将走向何方。如果“全面深改”取得成功，中共将实现自执政以来的第二次自我革命。第一次当然是邓小平先生主导的“改革开放”。

中国要进入正常市场国家行列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我们看到的是，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市场的主体，而不是做市场活动的裁判和监管者，这是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困局的深层次原因。关于这方面的话题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过去出版的《郎咸平说：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》。所以我们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清除阻碍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旧制度，这就是本书第一篇“革除阻碍改革的‘旧制度’：那只伸得过长的手”阐释的内容。在本篇里，我从国企垄断、权力腐败、金融垄断、政策楼市、土地财政、政府监管失责等方面，说明政府在市场方面越位和缺位的灾难性后果，并以此证明一个由政府操控的市场一定不是一个好市场。

为了解决上述问题，我们看到了执政者们在2014年连出四中全会《决定》、新《预算法》和“43号文件”三记重拳，以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。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二篇“政府出重拳，为市场保驾护航”阐述的内容。其中，最值得关注的是“43号文件”。各位晓得这个“43号文件”有多么重要吗？它将使地方政府彻底丧失投资能力，迫使地方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，“地方政府公司化”趋势将会得到基本遏制。我预测，“43号文件”将成为厘清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里程碑性

文件。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和领会这个文件。这三记重拳是以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形式，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非常了不起。关于厘定“政府与市场边界”的系统性思考，各位可以参阅我过去出版的《郎咸平说：改革如何再出发》一书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政府这只“有形的手”该用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认为，政府的精力应该放在建立“有效市场”方面，一个没有垄断的市场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。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三篇“有效市场：改革开启攻坚战”要讨论的内容。一个有效的市场应该是破除垄断、公平竞争的市场。在本篇里，我评述了2014年政府在价格改革、电力改革、电信改革、金融改革、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大动作。为什么说是“大动作”呢？因为这些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未完成的改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难，所以我将其称之为“攻坚战”。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，避免形成新的垄断利益集团的话，我对这些大动作的改革，在总体上给予积极的评价，并对改革的结果持乐观的态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改革，是在反腐败的大棒下进行的。

打破垄断的改革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。一个去除垄断，充分竞争的市场生态，才能真正孕育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。我一直认为，调结构、产业升级转型的主体是企业，而不是政府。政府要做的是，营造出一个“法无禁止即可行”的营商环境，营造出一个“充分竞争、公平有序”的市场环境，营造出一个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。本书第四篇“中国产业新常态”要讨论的，就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，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，该如何转型升级。我以互联网、通信、高铁、汽车、电子等产业为例，说明企业转型升级、增加竞争力的背后逻辑，供各位参考。

一个有为的政府，不仅应在国内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，而且应该像美国那样，在国际上为本国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格局。过去，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。令人兴奋的是，在2014年，我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大手笔布局。无论这些布局的最后

结果如何，我都看到了一个有为政府该有的动作。这些布局，改变了我们过去被动接受规则的困局，而是主动亮剑，开创了主动布局、创制规则的新局面。这就是本书第五篇“攘外是为了安内：国际经济新布局”要与各位讨论的内容。

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背后逻辑的理解。新常态建立的过程也是破除旧制度的过程，这是一条荆棘遍布的道路，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
在这里，我要感谢我的学术助手马行空及其率领的团队，没有他们的资料提供和初步研究，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；同时也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们，他们研究性的编辑工作，也为本书增色不少。

2014年12月30日星期二

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以新常态革除旧制度

郎咸平

无视中国经济问题本质的改革，注定以失败告终；但看到本质，却不懂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改革，同样以悲剧收场。

多年来我主要从民生和产业的视角，在解读经济乱象背后的制度根源基础上，坚持呼吁推行以“藏富于民”“政府的归政府，市场的归市场”为基本理念的经济改革。遗憾的是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“政府的归政府，市场的也归政府”“扩权争利、国进民退”的可怕景象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在近两年出版的《郎咸平说：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》《郎咸平说：让人头疼的热点》等书中的主要观点。

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，中国进入了新的政经周期。两年来，我们一方面看到政府“简政放权”“公布权力清单”等一系列“新政”出台，但同时，由于旧的制度惯性，以及多年来固化下来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，很多实质性的改革根本推动不下去，这才有了从“新政”到新常态的变化。那么，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？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的学者进行了解读，在本书中，我不想做任何重复，也不会从“增长速度、结构调整、经济增长新动力”等抽象的概念出发去解读，而是给大家讲清楚新常态的本质和逻辑究竟是什么，以及它将如何改变中国，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。

一、旧制度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：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

我在2014年5月份出版的《“新政”能否改变中国》一书中，曾毫不客气地指出“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”。在本书中，我想进一步指出，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就是中国经济旧制度的本质问题，绕开这个问题去谈“扩内需、调结构、保增长”，等等，都是假问题，或者说伪问题。解决假问题的结果，只不过是制造出更多的新问题。悲哀的是，这恰恰是我们一直在干的事情。

1. 改革为何越改越糟之用调控代替改革

过去十多年来，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我们的老百姓最怕改革，因为房改了买不起房，医改了看不起病，教改了上不起学。改革越改越糟！这是民生领域的改革结果，那么经济层面的改革呢？也是越改越糟的。

过去十多年，政府每年几乎都将“扩内需、调结构、保增长”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。但结果却是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，将本应给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，逆转为形形色色的扩权争利。“调结构、扩内需”在事实上被“保增长”取代，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，经济改革错失了最佳时机。

这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，在政府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，并没有以“壮士断臂”的魄力去推动像发改委等这样的强势部门向市场简政放权。本来，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起点较低，再加上人口、资源、环境等红利，使得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后发优势。因此，无论是产业改革，还是区域经济，只要政府向市场放权，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权，经济便会马上出现活力。国企改革，沿海和江浙地区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，都是如此。但接下来由于路径依赖，政府既不推动剩下的比较困难的改革，更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，而是围绕“保增长”的目

标，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“大棒”，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“踩刹车”，在经济遇冷时立即“踩油门”，这种反复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，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，不仅造成市场紊乱，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，更是一种灾难。在权力运行不规范，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被政府“看得见的手”束缚的情况下，频繁调控的结果就是财富快速向国有企业集中，权力再次向政府集中，社会贫富分化严重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固化，成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。这就是无视或者回避中国经济真问题的结果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，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，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，而且还发明一个口号，叫作“宏观调控，微观搞活”，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。我告诉各位，在一个土地、资本（金融）、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垄断的市场，调控有意义吗？结果只能是越调越乱，而且微观也搞不活。即便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。所以我说，政府是在用调控来代替真改革，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退出市场，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。

2. 改革为何越改越糟之用投资代替改革

如果用“调控”解决不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衰退问题，为了“保增长”，政府还有一个更懒惰的办法，那就是干脆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各类国有融资平台、国有企业或者大型项目，以拉动经济增长。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，我们的政府出台了“四万亿投资计划”，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、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之后，政府投资压倒了民众消费，而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，资产泡沫膨胀。这就是政府用投资代替改革造成的恶果。

我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的现象，称之为“政府行为公司化”。本来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刺激投资和消费，来拉动经济增长。而我们的政府，由于“政府办市场”思维惯性的依赖，

却采取了相反的路径，例如用调控和投资代替改革。我只能无话可说。

各位晓得“政府行为公司化”有什么严重后果吗？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、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严重后果。可以说，“政府行为公司化”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、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。

由于“政府行为公司化”，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土地、金融、资源、能源、交通等行业，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。结果如何呢？这些要素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。各位知道后果了吧？我想这也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重要原因吧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，很多本应服务于经济的政府部门，则以加强监管的名义扩权，以增加审批的方式设租寻租，出现了所谓的“公共利益部门化”现象。这个时候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就会停滞，经济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。

改革停滞后，为什么会出现“经济行为短期化”呢？这是由我们官员的考核方式和任期制度造成的。我们知道，无论哪个层级的地方官员，任期一般都是五年，而五年后对官员的升迁考核主要依据是，其在当地主政期间的GDP数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会是简政放权、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革，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大、周期长、见效慢。相反，集中手中权力和资源，上一些短期内容易出政绩的“大项目”则相对容易得多，比如，高污染、高能耗、高投入等产能过剩的“三高”项目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“铁公基”项目等。结果就是所谓的“官出数字，数字出官”。

好了，各位，透过上述分析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，政府只能用调控、投资这两种手段代替改革，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。说实话，也没有其他办法。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，如此循环反复，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。

但是，客观地讲，在原有经济社会运行框架内，让“公司化”的政府退出市场，这个问题从逻辑上是无解的。政府的自我“革命”，离开了

国家治理方式从传统治理向现代化治理的转型，只能是一句空话，而国家治理现代化，首先是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

二、“简政放权”和两个《决定》：用新常态革除中国经济旧制度

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首度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，随后对新常态的解读看似铺天盖地，但很多都是千篇一律。我认为，如果不能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理解，那么对新常态的认识就是一种盲人摸象。那么，什么是新常态？其本质和逻辑到底是什么？

我对新常态的理解，可能和很多人不太一样。在我看来，新常态并不是某一次会议，某一项政策，而是从确立正确的改革方向到逐一落实的动态过程，或者说，新常态不是某一个“点”，而是一个“域”。新一届领导班子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“新政”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和十八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这“三板斧”进入新常态的。

各位一定记得，新一届中央领导上台伊始，即把简政放权作为头等大事。据统计，在短短一年内，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，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。在2014年“两会”期间，李克强总理又明确表态，将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，同时要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。确需行政审批的，建立权力清单，清单之外的，一律不得实施审批。新一届政府上台第一年，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，被媒体称为“新政”。

不难发现，“新政”基本是行政管理层面的简政放权，主要是通过厘清“哪些归市场，哪些归政府”，来解决“公共利益部门化”问题。具体可以用两个层面的三句话讲清楚：对于市场主体而言，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，主要目的是激发企业活力，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；对于政府来说，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“法定职责必须为”，其目的在于通过反垄断、保护知识产权，创造好的营商环境，让市场充分发育。用官方话来讲就是“建立并维护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运行机制”。

革除“政府行为公司化”状态下的旧制度，仅仅依靠行政管理层面的简政放权显然是不够的。前面讲了，“政府行为公司化”，除了导致“公共利益部门化”外，还必然导致“经济垄断化”和“经济行为短期化”。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，通过规划一幅横向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“五位一体”的改革蓝图，让政府回归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本位，与市场划清界限。四中全会则勾勒了一个纵向的法治秩序下的市场经济愿景，建设法治政府，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两个《决定》从不同角度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，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确立了一套基本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框架，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政府公司化问题。所以这两个《决定》是并列的姊妹篇。

好了，我们现在从新常态的角度重新审视两个《决定》。显然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，主要是调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。即明确规定，在资源配置中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，而不是政府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这等于为政府行为划定了上限（不得“越位”代替市场）和下限（公共服务职能不得“缺位”），所以说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的重心是压缩公权力，放大私权利，让政府回归本位，激活市场活力。再来看四中全会《决定》。大家都知道，真正的市场经济，或者说，常态下的市场经济，一定是法治经济。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解除政府对市场束缚后，四中全会《决定》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秩序当然是应有之义。但客观地说，四中全会《决定》主要停留在用法治培育市场经济的层面，建设健全的法制市场经济体系目前来看还为时尚早。比如，四中全会《决定》中司法改革部分，禁止党和政府领导人插手具体案件的审理，以及建立跨区域的司法系统，就是为了克服阻碍市场经济的地方保护主义。所以说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的重心是规范公权力，以保护私权利，让市场经济成为常态化的法治经济。

各位清楚了吧，政府就是通过这“三板斧”（前面谈到的新政，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），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奠定制度基础。这些制度，悄

然地把中国经济带入了新常态。新常态的目标很清楚，那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，一个法治经济的国家，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这就是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和本质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一般认为，现代国家经济治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：一是政府权力和责任的界定，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“新政”和中全会《决定》，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；二是市场的规范与监管，四中全会《决定》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；三是规范政府的收入与支出，政府通过新《预算法》，透过“全面、公开和权威”的原则，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我们看到，中国经济新常态，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向前推动的。因此，新常态的本质就是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使命就是通过革除旧制度，让中国经济社会最终进入常态。

各位，通过上面的梳理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什么是新常态的背后逻辑和本质。不搞清楚这些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，就是盲人摸象，搞不好会把新常态带上邪路。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，采取的对内改革措施和对外经济战略布局，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，虽然令人眼花缭乱，但其背后是有逻辑的。这就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。

三、新常态的影响程度将超过“南方讲话”

我们知道，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“南方讲话”，以及随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政策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。比如，透过国企改革放开了几乎所有的竞争领域，设立证券市场等改变了中国的财富版图，“下海潮”“打工潮”“创业潮”等则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但是，新常态对整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影响程度，将会远远超过当年的“南方讲话”。下面，我想超越经济话题，谈谈新常态的影响力。

1. 新常态将引发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“创业潮”

我们的官员过去之所以“前腐后继”，原因就是我不反复讲的，政府这

只“看得见的手”伸得太长，管得太多，“政府行为公司化”和“公共利益部门化”现象让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寻租设租和腐败的机会太多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是我在2012年出版的《郎咸平说：让人头疼的热点》一书中提出的“给市场放权”+“强化预算制度”。新常态已经打出的简政放权、“拍苍蝇、打老虎”的反腐败、规范财政预算等组合拳，就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，斩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利益链条。所以说，过惯了好日子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，接下来要么换“大脑”，适应新常态；要么换“地方”，下海创业。说实话，给市场放权的新常态，给创业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，我预测，很多有能力有头脑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，一定会下海创业。当然，新常态也可能会带来新的“下岗潮”。

2. 新常态使中国变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

我这么讲的潜台词就是，不管以前别人承认不承认，事实上我们还算不上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大家晓得，正常的市场经济，至少同时满足三个条件：产权清晰、市场配置资源以及法治保障。我们保护私有财产权的《物权法》虽然颁布施行好几年了，但从产权界定角度看，还没有触及国有企业和土地这两个最头疼的问题。至于市场主体这一块，过去我一直呼吁的“政府的归政府，市场的归市场”，针对的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代替市场配置主要资源的现象。至于法治保障，由于政府过于强势，市场根本无法在法治框架下与其抗衡。前面说了，“简政放权”和两个《决定》以及新《预算法》，就是用顶层设计的方式，逐一清理阻碍市场经济的旧制度，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

3. 新常态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河

作为一名经济学者，我很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。但我从来都认为，市场体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治理经济的最有效的制度，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市场体

制本身，就是一个自由、公开、平等和竞争的机制。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，说到底就是一套如何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制度和机制。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，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透过“简政放权”和两个《决定》以及新《预算法》这三板斧，重新调整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，你说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，是什么？很多人绕开经济改革，将政治体制改革简单等同于民主选举。民主当然是好事情，但这里我要讲的是，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前提，政治民主就是空中楼阁，我们的邻居印度就是前车之鉴。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，但总得有个先后顺序问题，站在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，我认为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让政府回归本位，让市场经济名副其实。因此，新常态表面看是经济改革，实际上却是真刀实枪的开创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。

4. 新常态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由参与者变成建设者

大家晓得，改革开放至今，我们一直都是努力尝试融入世界经济格局。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，建立“三资”企业，从建立外向型经济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，一直到中国加入 WTO，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。回顾中国经济发展过程，可以看出，整个过程，中国只处于“融入者”和“参与者”的角色，导致我们在国际贸易争端当中，一直处于“被动挨打”的局面。新常态下的对外经济布局，我们开始“亮剑”，标志事件就是“一带一路”（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）。不同的是，以前我们只是参与者，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没有太多话语权的跟随者。“一带一路”以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“丝路基金”，则是由中国政府发起并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，这次我们不仅是参与者，而且还是新的经济格局的倡导者和建设者。

5. 新常态将使中国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之中

大家晓得，新中国成立至今，我们一共有两次融入世界格局的尝试。

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“珍宝岛事件”引发的中美建交以及恢复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身份，新中国正式融入世界政治格局并成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。这是由毛泽东先生主导的第一次大格局，即政治大格局。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建立外向型经济，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，中国开始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，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这是由邓小平先生主导的第二次大格局，即经济大格局。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，我们正面临着“经济包围圈”“军事包围圈”“能源包围圈”等威胁，尤其美国重返亚洲之后，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。我们在周边几乎没有朋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？因为对你不信任。为什么不信任呢？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在文化和价值观领域没有融入世界大格局之中！

我曾讲过，新常态是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。本书重点梳理了经济层面主要问题和应对思路，大家读后一定会觉得布局很好。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先打击一下大家，对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，融入世界格局难度最大的并不是经济，而是文化和价值观。

2012年十八大提出的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，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可以看作是新常态下的文化和价值观体系。这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的最大特点其实是四个字：兼容并包。直白点说，就是我们接受西方文明中自由、平等价值观，也尊重个体的权利和价值，但我们决不搞文化虚无主义，不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、友善等价值观，我们在强调个体价值的同时，也注重国家富强和社会和谐。兼容并包是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的生命力所在。

我乐观地预言，由习近平先生主导的融入世界的中国第三次大格局，即文化和价值观大格局已经启航，并一定会实现。至此，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正常市场经济国家，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。

目 录

序言 我对本轮经济改革总体上持谨慎正面评价 / 001

导论 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以新常态革除旧制度 / 001

第一篇 革除阻碍改革的旧制度：那只伸得过长的手

第一章 国企：绝对的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 / 002

一、央企腐败已被政府抬上了台面 / 002

二、央企高管透过国有资产交易，从中牟取暴利 / 004

三、国企招投标、海外投资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 / 006

第二章 权力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/ 009

一、中国“权力金字塔”透过财权、人事升迁权实现由上而下的管控 / 010

二、美国行政体制：财权受预算制度制约，人事升迁与上级无关 / 012

三、好的政府管理系统=美国式预算制度+中国式升迁制度 / 014

第三章 银行危机导致中国楼市危机：金融垄断的恶果 / 016

一、楼市出现量价齐跌，原因在楼市之外 / 016

二、商业银行资本金成本高企，不愿做长时间、低回报的

按揭贷款 / 018

三、房地产商透过“影子银行”借贷，终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/ 022

第四章 楼市危机：政府难逃不当干预的责任 / 026

一、过去五年，中国多建了4000万套房子 / 026

二、银行危机引爆房地产一连串危机 / 028

三、房地产危机引爆地方财政危机 / 031

第五章 楼市危机引发地方财政危机：土地财政寿终正寝 / 034

一、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不能容忍房价下跌 / 034

二、英美的经验：政府该如何干预房地产市场 / 036

三、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政府干预下毁于一旦 / 039

四、因政府干预扰乱市场正常信号，10.4万亿资金盲目进入房地产业 / 041

第六章 市场秩序：政府监管职责不能缺位 / 044

一、洋品牌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普遍存在质量问题 / 044

二、政府监管缺位，造成洋品牌的“中国病” / 046

三、公共安全受到侵害，政府必须挺身而出、严刑峻法 / 050

第二篇 政府出重拳，为市场保驾护航

第七章 “43号文件”：政府丧失投资能力，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/ 054

一、投资型政府是地方债务危机的制造者 / 054

二、“政府公司化”导致工业和房地产产能过剩 / 057

三、丧失投资能力，迫使地方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/ 059

第八章 中国预算：还可割断和规范政府投资的市场行为 / 064

一、中国旧式政府预算：导致各级政府“暗箱操作”出贪腐 / 064

二、新《预算法》是制度反腐的重要机制 / 066